

## 社會互信與專業主義的貧乏： 對台灣大選的觀察

陳韜文\*

於我而言，台灣既是生疏又是親切。說它生疏，因為我畢竟沒有在台灣長期住過；說它親切，因為 70 年代初我還在美國念大學本科時，一方面透過保釣運動認識台灣和結識台灣同學，同時也不時閱讀李敖、殷海光、胡適等人的著作，現在也有不少台灣朋友，關注台灣的動態。

### 壹、從民主化到極化

在 80 年代中以前，台灣給人的印象是政治高壓獨裁，官員貪污腐敗，社會要面對現代轉向的壓力，文化承繼中國傳統之餘，也要面對西化的挑戰。由於中國大陸實行文革，而香港又是殖民地，對於嚮往中國文化的香港青年而言，台灣反而成了靈感的來源。到了今天，台灣已然大變，不可同日而語。

殷海光和胡適固然早已不在人世，鮮有被公眾提及；連尚在人間的李敖，雖有超常的意志，其風頭和影響也已為新興輿論領袖所掩蓋。政治上，台灣集權獨裁已轉向民主多元，當年連原形未具的民進黨也已取國民黨而代之。高等教育方面，台灣遍地開花，除了為美國培養出幾位準諾貝爾獎人才外，單是擁有傳播學博士學位的人士聽說也有兩三百之數，研究活動頻繁。誠品書店、《中時》副刊和眾多出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E-mail: jchan003@yahoo.com

版社成了台灣文化氣息的象徵，看到它們，香港自然產生一種比不上的感覺。一度使知識界分裂的西化問題已不再是問題，「去中國化」則是當下爭議所在。當年被壓制的地方文化和族群，如今已經取得主導地位，害怕被排斥的反而是曾經佔有霸權地位的「中原」文化。

這一切變化使台灣更具吸引力，使人有一探究竟的好奇。雖然平常有閱讀台灣的消息，也有跟台灣朋友聊天，但缺乏的是現場的了解。幸好今年三月下旬獲邀參與台灣大選學者觀察團，前後雖然只有幾天時間，但是適逢關鍵時刻，對台灣內部的張力，有較深的感受，可算是現場補課。

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台灣社會因為族群矛盾和政黨政治引發兩極對立的現象。這邊是傾向台灣獨立、親民進黨和認同本省藉的綠營；那邊是傾向保持台海現狀、親國親兩黨、和以外省人為根源的藍營。本來，兩黨政治運作下，政治傾向二分，也是常理，但是台灣分化是全方位的，而且觸及敏感的族群問題，所以才有令人擔憂的撕裂性效果。族群身份不由個人選擇，而是與生俱來，有其歷史的因由，是以對立的族群同處一社會內，既然不可肉體上消滅對方，彼此唯有互相容忍，否則社會系統難以維持和發展下去。台灣社會的分化如今已經深入日常生活，連男女關係和家庭和諧也受到波及。更有甚者，有人因為整個社會的對立而選擇遷離台灣。中共隔岸加壓，而台灣內部則分化對立，試問台灣人民何以安身立命？身為國家的領導人，不管是那個黨派的，都有責任緩解族群的矛盾。對於像我一樣的觀察者來說，這是常識性要求。

## 貳、社會互信與傳媒專業主義的缺乏

與台灣極化對立相對應的是社會互信的缺乏。最能反映互信缺乏的事情莫過於陳水扁中槍事件。如何中槍？有否中槍？是真有刺客或

是陳水扁自導自演？無論台灣政府作出了甚麼樣的澄清，傳媒和民間還是議論紛紛。綠營的民眾忿忿不平，認為有人要取他們總統的性命，而藍營的民眾則歸因陳水扁為了當選而無所不用其極，甚至懷疑肚皮也是別人的。選後兩黨因為票數相差太少，引起國親聯盟的挑戰，要重點和重選，觸發連串的街頭抗爭，至今下筆寫此文時，爭論尚未平息。從選前的「基本盤」分析，藍營勝券在握，最後綠營卻反敗為勝，如果不是槍擊和族群互動的結果，很難解釋當中「翻盤」的現象，足見族群意識在台灣政治中的關鍵作用。要解決互信問題，首先要修復族群的裂痕。

又與互信缺乏相互呼應的是台灣的制度中立性和權威性的不足，而社會的中間力量、以致傳媒的專業主義也好像發育不全，影響社會的互信程度。投票如何投？如何點票？由誰監察？如有爭議，該如何處理？從台灣的教育水平和政治經驗來看，這些都應該由法律規範好，遇到爭議就按本子辦，實在沒有必要弄至街頭浴血。台灣不少當權者是念法律過來的，照理應該特別重視建立法治和程序的權威性，可惜事與願違，台灣法治還未成爲政治文化的肌理，對程序的尊重似乎也很不足夠。

社會遇到對立，通常會誘發中間力量，包括大眾傳媒，扮演仲裁的角色。但是，台灣不少學者、專業人員和傳媒在政治上已經明確選邊，或是在形格勢禁的情況下不敢發言，以致一時之間沒法發揮仲裁的作用。台灣傳媒，不管是印刷或是電子媒體，在遇到總統中槍的突發危機，不但未能有效澄清事態和穩定社會，反而推波助瀾，促使社會進一步兩極分化。陳文茜在槍擊當晚在電視台帶領觀眾叫喊口號、鼓吹動員，台灣傳媒政治化程度之高可見一斑。傳媒政治化不一定是問題，歐洲傳媒的政治化傳統一般就要比美國來得明顯。台灣兩黨的政策差異大，傳媒的政治光譜因而較爲寬廣，這是傳媒與政黨政治互相對應的結果。不過，如果有些傳媒能夠保持較爲「客觀公正」立場，遇到重大爭議，可以扮演緩衝矛盾的第三者角色。

台灣的傳媒不但未能起到緩衝的作用，從報票的過程觀之，但見各電視台在眾目睽睽之下仍然實行「灌票」，醜態百出，竟然連消息要準確的基本專業要求都棄而不顧。有電視台事前更大張旗鼓要做甚麼「出口民調」和「改良出口民調」，結果在預定時刻，在沒有甚麼解釋之下食言不報。以台灣的教育水平和電視台的資源完成甚麼民調本來不是甚麼難題，但是台灣電視台還是在最後關頭虛實不分，使人看得眼花撩亂，足見口頭專業主義——「講一套、做一套」——的虛妄。傳媒專業主義的保守性在西方早已受到批判，我無意在這裡為其「平反」，不過，台灣的經驗顯示，傳媒專業主義在不同和特定的時空中，仍然有它正面的社會意義，不宜全面丟棄。

## 參、反思香港

看著台灣，同團的團友感慨之餘，最後還是想到香港。團友大多是香港民主化的推動者，一向視台灣為民主化成功的案例，如今台灣選舉亂象叢生，彼此自然想到回到香港如何面對論敵攻擊的問題。後來細心一想，發現香港制度的中立性和權威都不錯，而且民間社會力量相當雄厚，中間派力量在社會也擁很高的公信力，傳媒的專業性雖然不足自豪，但尚未淪落到「灌票」的地步，最重要的是香港沒有足以撕裂社會的族群矛盾。以此觀之，香港反而更加具備民主化的條件，團友因此才感覺好過一點，重燃對香港民主的信心。也許，台灣在選舉方面先走一步，但要補足的是配套的民主化條件，而香港具備了民主的條件，所欠的則是普選的東風。